

上海地区家训文化的历史资源及其现代价值

熊月之

中华文明之所以自古至今五千年从未中断,有多种因素,其中很重要一条,就是她有完整的、系统的、有效的传承机制,包括国家训导系统、榜样示范系统、制度保障系统、日常教化系统、宗教警诫系统。家训、家规就是日常教化系统的一部分。

在人类文明史上,中华文明最重视上下传承。中国人最强调孝与教,孝是下对上,教是上对下。中国人最重视对子女的教育,最重视在子女教育上投资。中华以农立国,自给自足,以家族血缘关系为纽带,人口流动范围较小,频率较低。其生产知识、生活知识,多从上辈那里继承而来,多属于默会知识,靠示范琢磨,靠耳提面命式的传授。所以,在中华文化中,上下关系特别重要,中国家训文化也就特别发达。据研究,从西周开始,到近代,比较正规的家训就有120多种,如果那些包含训诫子孙意义的书信、文章、格言、联语在内,非正式的家训,那就难计其数。

上海地区也有丰富的家训资源。在日前召开的“上海市家训家风文化的传承与发展研讨会”所提供的资料中,提到了上海县的徐光启、高行的曹瑛在竹枝词中体现的家训内容、浦东的傅心鲁家谱中的“十六字”家法、浦东的傅雷家书、松江叶氏家训、泗泾《秦氏家训》等。除此之外,还有很多。

首先,古代上海,有丰富的家训资源。

全国家训资源,明清以前,北方丰富,明清时期,南方开始多了起来。我简单地梳理了一下自己比较熟悉的或知道的,上海地区还有很多家训方面的资源。

关于古代,举三个例子:

例一,明朝松江人钱福,著有《明日歌》,影响非常之大。“明日复明日,明日何其多”。教科书上都有。《明日歌》虽然没有明确地说这是家训,但是,其教化的意义非常明显。

例二,晚明时期松江人陈继儒,诸生,隐居昆山之阳,杜门著述,工诗善文,名重一时。屡奉诏征用,皆以疾辞。崇祯十二年卒,年八十二。所著《安得长者言》,讲怎么做人处事,内容极其丰富,极有见地,极有价值。例如,他教育人要行善积德,说是假如一个人,“闻人善则疑之,闻人恶则信之,此满腔杀机也。”他以登塔比喻为善,说是登塔要有人作伴,有人鼓励,才能登上去,登的过程才不觉得很累。为善,努力向上,也是如此。他说,做人行事要得体,“富贵家,宜劝他宽;聪明人,宜劝他厚。”“喜时之言多失信,怒时之言多失体。”他还认为,家庭财富太多,容易使亲情淡薄;反过来,财富不是太多,反而亲情浓厚。这些,都充满了智慧。

例三,清初人陆陇其(1630年—1692年),浙江平湖人。康熙九年(1670年)进士,康熙十四年授嘉定(今属上海)知县,官至监察御史,以清正廉洁而

著称。他在给儿子的家信中说:“我虽在家,深以汝读书为念。非欲汝读书取富贵,实欲汝读书明圣贤道理,免为流俗之人。读书做人不是两件事,将所读之书,句句体贴到自己身上,便是做人的法。”读书是为了明白道理,以求做一个明明白白的立身天地之间的大写的人,从而无愧于自我,无愧于家庭,无愧于社会,无愧于国家。也就是说,通过读书学习,变化气质,成为一个堂堂正正的人。他关于家训家规方面的内容极其丰富,也相当有名。陈宏谋编《五种遗规》时,就收录了陆陇其教育儿子的书信。

其次,近代上海,家训家规家风方面,资源更多,更值得重视。这很能体现上海的特点。

这可以分为两方面,一方面,上海本地名人李平书、穆藕初、黄炎培,都有家训方面的内容。另一方面,长期工作生活在上海的原籍不是上海的人。

先说上海本地人。

1894年,李平书署陆丰知县。这是第一次做地方父母官,他对自己提出严格的要求,自撰一篇风格奇特的誓文,并予以公示:表示,如果自己“敢受百姓银钱财物,多自千百,少至毫芒,不论是否应得,一经染指,即犯贪赃。又若藉案科罚,本干例章,名为充公,实饱私囊,此巧取之伎俩,亦廉耻之道亡。予小子而或蹈此二者,神降我以百殃。”在进入陆丰县境的途中,短短几十里路程,就有拦路递交红呈35起。所谓红呈,就是红包。送红呈的人或要他申冤,或向他求情。他理所当然地一一回绝。再次公开张贴誓言:“词讼案件收受案内外人银钱财物,无论多少,一经染指,即是丧心昧良,干犯宪墨,明即倖逃国法,幽难难免冥诛,他日去此,水行必沉于大海,陆行必踣于高山。天地明神,实闻此言。”

李平书并不是无神论者,官场规则也没有要求他上任时必须立誓,但他如此对天发誓,掷地有声,不怕报应,充分表明了他对贪墨贿赂、中饱私囊种种腐败现象深恶痛绝,表示了他与这些丑恶现象决裂的坚强决心。李平书说到做到。做官期间,有些钱按照陋规(即潜规则)是可以拿的,他也坚决不拿。一生当中,他担任的肥缺不知多少,经手的银钱不知多少,但他从不心动,一身正气,两袖清风,以至于晚年想印刷《且顽老人七十岁自叙》都囊中羞涩,而要靠朋友资助。

再说黄炎培:“理必求真,事必求实,言必守信,行必踏实;事闲勿荒,事繁勿慌,有言必信,无欲则刚;如若春风,肃若秋霜。取象于钱,外圆内方。”12句话,48个字,真是做人做事的极好的座右铭!

长期生活在外地来的人,在家训家规方面,资源特别丰富。

比如郑观应,原籍是广东香山,十几岁就到上海来发展,是著名思想家与企业家。他

教育子女:“立志在青年、老来悔已晚。须观有用书,学业身之本。蜘蛛能结网,仰食愧为人。一艺不能学,何由寄此身!”

他的家训很有时代特点。对于金钱交易活动,郑观应告诉子弟应慎之又慎,并具体交代了种种需加注意的方面:“日中行事无论贤否亲疏,所收银钱必须当面点明,收藏妥当,不可草率乱放,恐顾此失彼,非惟忙中有错,且恐事后忘却也。所交银钱要件必须真正亲笔收条。不可大意,一则恐日后不认,二则备将来稽查。吕端大事不糊涂,诸葛一生惟谨慎,古之伟人尚且如此,何况我辈?”

聂云台是曾国藩的外孙,父亲聂缉槩当过江苏巡抚。聂云台主要生活在上海,1893年到美国留学,回国以后担任上海恒丰纺织新局总经理,是上海最著名的实业家之一,曾捐助聂中丞公学,即市东中学。

聂云台与他的父亲聂缉槩先后两次赞助出版《德育古鉴》,这是一本教人行善积德的书。聂缉槩、聂云台都曾为此书作序。此书系中华伦理道德教育的重要经典,为后人广为传诵。1906年,聂缉槩将其重新刊行。后经印光老法师所称许,由弘化社重印多版,共数万册之多。1929年再版,聂其杰作序。前些年,马来西亚中华文化教育中心曾将其校订出版,作为马来西亚中华文化教育中心师生必修之德育教材。书中以翔实的历史故事,从孝顺、和睦、慈教、宽下、劝化、救济、交财、奢侈、性行、敬圣和存心等方面,阐述了祸由我作、福自己求的道理,以此引导世人转恶为善、转迷为悟、转凡成圣。常读此书,可以起到近报自己、远利子孙的效果,实为今人修身立命之必读、传授子孙之必备。聂缉槩评价此书:“其语取平易而近人,其理合劝惩而并用。固宜其如日月之经天,江河之行地,历百世而不易矣。”聂其杰称:“予幼时遵庭训,亦每日背诵斯篇,与经书同。”

聂云台在家训家规方面,最为突出的是,作为一个拥有巨额财富的大资本家,他特别教育人们,如何正确地对待财富,劝人们要善于用这些财富为社会造福。1942—1943年,他写了本《保富法》,刊登在《申报》上,专门讲这个道理。书出版以后,影响极大,读者深受感化,于数日间,捐入《“申报”读者助学金》,多达四十七万五千元之巨,传为佳话。商界、文化界名人纷纷撰文力荐,为流传不吝费力。聂云台的财富当然不及比尔·盖茨,不及巴菲特,但是,他对待财富的哲学,与比尔·盖茨、巴菲特一样,强调要为社会做事。

李平书、郑观应、聂云台的家训家规,都很有近现代气息。这些家训家规产生在城市里,产生在商业社会,与产生在农耕文明时代的《颜氏家训》很不一样。这些家训,能体现出上海城市的特点,尤其值得挖掘与整理。

助皇后悲哀

胡言

在汉初历史上,汉文帝窦皇后一家的经历绝对是个传奇。且不说窦皇后饱受命运的播弄,却阴差阳错地做成了皇后,只说窦皇后的弟弟窦广国,四五岁时成了被拐卖儿童,且连续被转卖了十几家,基本上过的是奴隶生活。后来辗转来到长安,听说新皇后姓窦氏,老家在观津,正巧这两点他还记得,便上书要求认阿姐。《史记·外戚世家》记姐弟重逢事极为生动。因为姐弟俩自幼失散,如今相貌已依稀难辨,故汉文帝反复询问窦广国,以免有人冒名顶替(此类事历史上极多,故不得不防也)。窦广国以一个不为人知的细节,最终证明了自己的身份,赢得了汉文帝与窦皇后的信任:

窦皇后言之于文帝,召见,问之,具言其故,果是。又复问他何以验?对曰:“姊去我西时,与我决于传舍中,丐沐沐我,请食饭我,乃去。”于是窦后持之而泣,泣涕交横下。侍御左右皆伏地泣,助皇后悲哀。

对《史记》中的这个细节,林琴南竭力称道,并发挥想象,以小说家(或翻译家)的手笔,生动描摹其情状道:

呜呼!史公之写物情,挚矣!今试瞑目思窦姬在行时,迨将入代(胡言按:应是入宫,入代尚在其后),而稚弟恋姊如母,依依旅灯明灭之中,囚首丧面。窦姬知此行定无可相见之期,计一身与稚弟相聚一晷刻间,即当尽一晷刻手足之谊,不能不向从者丐沐而请食。下一“丐”字、“请”字,可见杂沓之中,车马已驾,纷纷且行,窦广国身随其姊在行中,直一贅疣,不巧且不得沐,不请且不得食。沐已饭已,匆匆登车,亦不计弟之何属。此在情事中特一毫末耳,而施之文中,觉窦皇后之深情,窦广国身世之落漠,寥寥数语,而惨状悲怀,已尽呈纸上。(《春觉斋论文·述旨三》)

林琴南非常重视细节在文章中的作用,也因此而能发人之所未发,看到那些历来被忽视的细节,对《史记》文章的价值作出新的判断。尤其是他对欧阳修《泂冈阡表》、归有光《项脊轩记》的评价:“琐琐屑屑,均家常之语,乃至百读不厌,斯亦奇矣!”(同上)更是承袭他对《史记》的上述看法而来,成为表扬二文的最著名评价之一(不过,林琴南的立论与评价虽极有见地,其前提却是出于对王充《论衡》的误读,他把《论衡·自纪篇》的“调辞以务似者失情”,读成了“调辞以务似者生情”,把王充本来对于模拟的批评之意,读成了“且‘似’字亦非貌似之谓,直当时曲有此情事,登之文字之中而肖耳”(同上)。这实在是一种“郢书燕说”,却“歪打正着”,成为其肯定三家之文的依据,也是一件饶有意思的事情)。

不过,他评价“侍御左右皆伏地泣,助皇后悲哀”一语,仅从“风趣”着眼,却似乎又得之浅:

悲哀宁能助耶?然舍却“助”字,



▲ 林琴南作《山居图》

又似无字可以替换。苟令窦皇后见之,思及“助”字之妙,亦且破涕为笑。求风趣者,能从此处着眼,方得真相。(《春觉斋论文·应知八则·风趣》)

“风趣”则果然风趣矣,但若仔细品味这句粗看起来像是闲笔的话,是足可以品出《史记》所特有的看透人情世故、世态炎凉的苍凉的一个“助”字,是何等的神来之笔呵,又岂止是一个“风趣”所能得了!

后来能得此类表现之神髓的,大概还得数《儒林外史》。如第四回,写范进中了举,范老太太欢喜得痰迷心窍,一命归天。范家操办丧事,众人各司其职,忙忙碌碌,只有丈人胡老爹多余,“上不得台盘,只好在厨房里,或女儿房里,帮着量白布,秤肉,乱窜”。“乱窜”虽然“吃相难看”,但好歹也算是在“助悲”,是做给新科举人女婿看的,也是给母以子贵的范老太太的面子。

又如第十五回,写自称活了三百多岁的“活神仙”洪憨仙“忽然又死起来”,其家人操办丧事,上上下下忙得不亦乐乎,却也各司其职,职责分明:“儿子守着哭泣,侄子上街买棺材,女婿无事,同马二先生到间壁茶馆里谈谈。”洪憨仙左右不过是个江湖骗子,所以一旦“死起来”,做女婿的也是可以“无事”,而不必“助悲”的。

古人行文,常讲究“春秋笔法”。但“助悲”也好,“乱窜”也好,“无事”也好,既可以说与“春秋笔法”精神相通,又岂止是“春秋笔法”所能涵盖的!

